

相术学与明清小说

万晴川

看相、算命的习俗,是中国古代最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往往总是简单地斥之为封建迷信,而置之不问,这势必影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度。本文就谈谈相术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我们简要谈谈相术学之所以能影响明清小说的社会文化背景。

命相学是研究生命体形式和现象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学研究的也是人学,这就决定了两者所涉及的范围必然有相互交叉和渗透之处。

相术学对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东汉末年至魏晋时,官员的选拔采取“九品中正制”,相貌是个重要的标准之一,因此当时出现了不少有关人伦鉴识之学的著作,而东汉以后的相书就往往把东汉郭林宗的人伦鉴识专著作为遵从的原则。“人伦鉴识”之学对志人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世说新语》就专设“容止”门。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取士制,但相貌仍是影响士子前途的重要因素。民间就流传着钟馗因貌丑而下第的传说。尤其是探花的录取,外貌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进士录取后,要获取一个好位置,相貌仍很重要。例如明代,据尹直《蹇斋琐录》说:检讨之职,要“人物俊伟、语音正当”。六科给事中的人选,也要“体貌丰伟、音吐正当”,唐宋都如此。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免,朝廷往往要咨询相士。据《铁围山丛谈》云:宋代政和、宣和年间,朝廷提升或罢免侍从以上重要官员,常常“先命相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故一时术者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甚至一些重要政治决策、皇储的确立、将领的选拔等,皇帝都要参

考相术家的意见。有些皇帝自己也精于相术,如杨坚、李世民等。相术学发展到明清时代,达到了它的高峰期。“洪武中,朝廷访求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侯、食禄千五百石”。^①金忠、万祺等都以精通术数而跻身高位。清初也下过类似的诏令。而且,明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与术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朱元璋夺取天下之与刘基、周颠仙、铁冠道人的帮助、燕王夺嫡之与袁氏父子、姚广孝的促成,宁王反叛之与刘养正的启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术学的发展。以致“近世大儒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②“士大夫夫人能讲,日日去讲。”^③这种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到作家的创作。

从小说家本人而言,大多才华横溢,但又穷困潦倒,命运乖蹇,不得志于当时。他们常常易于把一生遭际坎坷的原因归之于命运小儿的播弄,再加上他们中有许多人本身就精通相术,这使得他们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在主题确立、谋篇布局、人物刻画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相术学的影响,本文就从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相术学对明清小说主题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它的命运观。

中国古代经典正统文化也提出了命运论思想。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人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以俟命”。这里所说的“天”,是指主宰一切的天帝,天帝决定每个人的寿夭、穷通和等级。庄子则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命”是无法理解、无法把握、无法逃避的,人只可以顺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胜也。”庄子所说

的“天”则是指自然，但这种自然也是人所无可奈何、无法抗拒的。相术学的命定论又与前二者不同，它是建立在人的先天自然禀赋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人的生死贵贱都是“天之所禀”的自然之数。但它与儒道的宿命论性质是一致的。相术学的命定论进一步确立和深化了经典正统文化中的命定论。经典正统文化中的命定论概念还比较笼统，对个人命运与整个宇宙之间的具体关系、个人命运运动的程度原理等有关具体问题，并未作出详细的微观研究。而相术命运学则不然，个人命运是它们研究的专题，命定论是他们研究的全部结论。中国所有的命定论思想到他们手里才得到不断系统的整理，并上升为理论体系，而成为一种理性的观念。“命”的含意不再那么神秘含混，而被明确定为阴阳数值等级不同的配合和五行生克的变化。另外，它因为强调“天之所禀”的自然之数，对古代以宗法血缘定贵贱的封建制度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理论上把门阀世胄和平头百姓拉到了同一标准之内，因此它对人们的影响渗透力特别强。^④它对明清小说主题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绝大部分小说都表现了天命观。所谓“自古穷通皆由定”，“万事皆由天数定，一生都是命安排”。这个问题，前贤已有论述，笔者在此不再重复。

相术学的命定论确立和深化了世人听天由命的命运观，进一步否定了个人主观努力的作用和意义。所谓“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禀于天。……受气之始，相命既定，则鬼神不能改移，而圣智不能回也。”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事情成败最终取决于天数，个人处世的唯一正确方法是“知命安时”。同时也有不少人“以福禄在天，求之无益，舍置仁义而不求为善，是犹农夫任天不复耕耘其亩也。”这就违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终也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从而迫使相术学的命定理论发生变化。《荀子·非相》篇说：“相形不如论心”。荀子的本意在反对相术，却无意启发了相术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后来一些和尚道士迫于生计，也操起相术业，从而把佛道理论渗透到相术理论中。如释迦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些就被骨相学所吸收。相术家又把个人命运的“道”和“气”改换成佛道的“鬼神”和“冥司”，将命学本原于禀气说的“定数论”，偷换为本原于因缘说的“前定论”。“定数论”只

以人的自然禀赋来推断人的一生命运，而因缘说的“前定论”则依据佛教的因果轮回、转世报应和道家的善恶功过、现世现报的理论来谈论人的命运。他们认为：命相的好坏，既取决于人先天所禀的“气”，又离不开后天的“心术”。所谓“心术”，在儒家指道德修养，在佛家指善恶之行，“恶则祸结，善则福臻”。《度冥经》中说：“人有一分德器，必有一分衣禄；十分德器，必有十分衣禄。”《麻衣相法》中说：“未观形貌，先相心田。”“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心随相减。”^⑤《钱氏私志》载一行论相曰：“若其人忠孝仁义，所作所为，言相相应，颠沛造次，必归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言行不相应，颠沛造次必归于恶者，凶人也。吉人必获五福之报，凶人必获六极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若但于风骨气色中料其前途休咎，岂能悉中也。”这种思想同样反映到小说家的创作中。如《今古奇观》中《裴晋公义还原配》，作者开头就说：“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贵相之人，也有做下亏心事，损了阴德，反不得好结果。又有犯着恶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积阴功，反祸为福。此是人定胜天，非相法之不灵也。”裴度少年时，相士相他“纵理入口，法当饿死。”后来他拾到玉带，还了孝女，使她救了父亲。结果裴度“骨法全改，非复向日饿莩之相。”终于出将入相，大富大贵。《七真因果传》的作者也有同样的观点。所谓“外相不及内相，命好不如心好。”相士相邱长春“腾蛇锁口，应主饿死。”后来邱长春广行功德，结果骨相全变，“贵不可言”。《拍案惊奇》中的《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篇，写王部郎家的小厮郑兴儿，相士袁尚宝说他犯了恶相，会妨主。王部郎只得将兴儿辞退。兴儿失去工作后，在外拾到一大包银子，将其还给了失主。结果因这善行，“满面阴德纹起”，“骨相已变”。兴儿最终做到指挥使。《娱目醒心编》卷九写了两个类似的故事：一组是常州府秀才康友仁、丁国栋的故事。丁国栋“质地聪明，做事伶俐。”文章比康友仁写得好。两人同去参加乡试时，康友仁拾到一包银子，要将它还给失主，丁国栋却诈为己有，康友仁只得将自己的银子给了失主。结果改卷时，考官梦见朱衣人对他说明：“第三十六名姓丁的做了亏心事，天榜上已除他名字，换了姓康的。”更为奇怪的是，考官再读康友仁的卷子时，越读越有味；再读丁国栋的卷子时，却不能卒篇。后来自然康友仁中了举，接着又中了进

士。丁国栋落榜后,悲凉死去。另一组是秀才陆德秀、潘再安的故事。陆氏不贪女色,潘氏却贪恋女色,私通邻女。结果,尽管潘氏比陆氏有才华,该中第二名举人,却冥冥之中将举人让与陆氏了。

相术学的命定论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它充分体现了作者劝善惩恶的创作思想。

二

相术学对明清小说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一、用相士的判语作为整部小说的纲目,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一生作高度概括。古代一些历史学家在为帝王将相作传时,大多先描写他们奇异不凡的生理形态,或叙述一段关于他们的命相传闻,以此作为历史人物的行状之纲,然后根据这个行状之纲来撰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生平事迹。不少受史传文体影响的小说也采用这种叙事模式。它以人物命运为纲谋篇布局,联缀生活具象,组合情节。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小说一开头就写相士为幼时的魏忠贤看相,说他“山根低陷,少年坎坷。所喜地角丰隆,中年荣贵。熊腰虎背,他时蟒玉围身,燕颌凤眉,异日威权独把。只是豺声蜂目,必好杀贪财,先主食人,后必自食。若能慈祥正直,可保令终。”这基本上把魏忠贤的性格特点及少年、中年和晚年的生平遭遇作了一个浓缩性的概括,以后的故事情节都按照这个纲要去演绎,去印证相士的判语。但又不完全如此,相士的最后两句话:“若能慈祥正直,可保令终”,又给读者造成了悬念。从相貌传递的信息看,魏忠贤不得善终,但人力又可挽回,结局到底如何,读者只有读完了文本才知道。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写法一样的还有《宜春香质·花集》等小说。

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结构类似的有《金瓶梅》,作者把相士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妻妾的相术判语放到了第二十九回,这些判语在整部小说的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竹坡指出:“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实际上它是整部小说的总纲,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一生命运和性格都作了

暗示和总结,所以张竹坡说“此书至此结亦可。”作者还在第九十一回写为孟玉楼卜龟,与吴神仙之相呼应。第九十六回写头陀为陈经济看相,又与吴神仙给西门大姐的判语照应,同时对陈经济前半生作一个总结,为他的结局埋下伏线。

《小奇酸志》是《金瓶梅》的续书,结构形式也全仿照《金瓶梅》。第十四回写李铁嘴为西门庆看相判语几乎是《金瓶梅》中吴神仙的翻版。但作者写西门庆最后幡然悔悟,皈依佛门,得以善终,这与他的外貌特征所蕴含的命相学意义相互矛盾。吴神仙说西门庆“两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诈”。李铁嘴则改为“二目雌雄,实主一世风流。”按《神相全编》中《张行简人伦大统赋》中云:“眼睛‘毗圆者,其机深于城域。’”《太乙真人书》云:“两眼雌雄,岂由仁由义之子?”可见《小奇酸志》的作者并不懂相术。

《红楼梦》又承继发展了《金瓶梅》的结构方式,并糅合了道家的“推背图”。第五回中的每一首仙曲都暗喻着金钗们的命运,曲牌的名称又是提示全书发展上的关目,《红楼梦曲》则可以作为全书的主题歌。无怪乎脂砚斋称此回为“一部纲绪所在。”

二、一个人外貌特征所蕴含的命相学意义成了推动故事发生、发展的动力。《醉醒石》中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谈逆谋》,是以明代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写成。和尚明果生得“方面大耳,广额耸鼻”,术士江朝相他将“富贵绝伦,威权无偶,是个帝王之造。”明果听了将信将疑,术士周道真和黑山又相他将“贵为九五,富有天下,命相俱合。”“登基只在丑字运、申酉之年。”明果便信以为真,他们结成一伙,密谋起事,以明果的异相为号召,结纳亡命。富人杨道真就因果果“生得玮异”,也来入伙,为起事筹备军粮。甚至一些太监见明果“方面大耳,狮鼻剑眉”,也来参与。最后事泄被诛。整个故事都围绕着明果的“异相”进行。长篇小说《续英烈传》,是叙述历史上燕王夺嫡的故事。建文和永乐帝的相貌特征所表现的命相意义始终推动和规范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开头写朱元璋摸长孙朱允炆的头,见他“头圆如日,真乃帝王之像,甚是欢喜,忽摸脑后,见微微扁了一片,便有些不快,因叹息道‘好一个头颅,可惜是半边月儿’。自此之后,便时常踌躇。”这时朱元璋的长子已经死去,按照规定,应立长孙为太子。但朱元璋深通相理,知道允炆之相是有始无终。又见第四子朱棣生得龙姿凤

表，英武异常，因此又有意立朱棣为皇储，但却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于是他召刘基来商议。刘基对他说：“天既生之，自有次第，故宋陈希夷见了宋太祖与宋太宗有一担挑两皇帝之谣，安可强也。”朱元璋道：“废一兴一，或者可也。”刘基道：“天之所兴，人岂能废！”“若欲后事而图，非徒无益，必且有害。”朱元璋只好听从刘基的劝告，顺应天命，立允炆为太子。朱棣听了大为失望。朱元璋死后，允炆即位，采取抑制藩王的政策，使朱棣更为不满。精通相理的道衍和尚屡次劝燕王起兵夺位，朱棣不敢贸然行事。为了慎重起见，他召来大相术家袁珙，自己故意杂处在卫士中，去酒楼饮酒取乐。结果袁珙一进酒楼就认出了朱棣，跪于地道：大王“龙形凤姿，天高地阔，额如圆璧，伏犀贯顶，日丽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龙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异日太平天子也。”朱棣听了他的话后，夺位之意遂决。不久建文派五大臣到北平，以重兵防监朱棣。朱棣深为不安，便派同样擅长相术的袁珙之子袁忠彻暗地里为五大臣看相。袁忠彻回来报告说：五人相都“犯凶”，“非令终之人”，“皆不足虑”。朱棣这才放心。后来事情的发展结局一如袁氏父子所言。据《菽园杂记》云：当时故老传闻，朱棣“初无入承大统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启之。”但据陆容考证，朱棣久有夺位之心，袁珙之相不过是强化了他这种野心而已。《续英烈传》的作者表现了当时“故老”的意见，把燕王夺嫡的历史事件完全写成是命相学推动的结果。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与《续英烈传》的结构方式又有所不同。他写兴儿通过行善改变了自己的骨相，挽回了命运。但它同样演绎的是相术学原理。与它类似的有《聊斋志异》中的《邵女》篇。作者认为妇人悍妒是命定的，是宿报。金氏虐杀两妾，虐待邵女都是“宿报”。邵女也懂相理，自知“命薄”，所以情愿作妾，甘心忍受金氏的种种非人折磨，“聊以泄造化之怒耳。”结果感动上苍，金氏炮烙她时，无意“烙断晦纹”，从此邵氏之运发生转机，薄命相成了福相。

三、小说家在叙述故事时，有意穿插一些相士之语，作为后来某些情节发生的伏线，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林兰香》第三十三回写耿朗即将远征，擅于相术的公明达对他说：你貌粹而神清，然带一种不舒之色，必内有隐忧。锡圭赐土，在所不难；而破境分钗，亦必不免。”耿朗去后不久，他的妾

燕梦卿果然死去。《野叟曝言》第六十五回，写文素臣看到权监靳仁，长得方面大耳，虎头鹤睛，但仔细估看后，暗忖道：“异相何在？颈上钩纹紫纹，当受天刑耳！”后来靳仁真的败亡。这类写法在明清小说中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枚举。

四、有些小说中写到的相士，在小说的结构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死之前为阳梦。他早年流落在外乞食，满身广疮，臭不可闻。有次到饭店乞讨，店主不让进店。正在厮闹时，座客中有个相士，见他身段雄伟，终非落魄亡人，有心要结识他，便上前把魏忠贤拉开，对他说：“你到了五十之外，极富极贵，王侯比肩。”并倾囊相赠，分手时又叮嘱他以后要“尽忠报国，便得保全身命。”忠贤从此起死回生，广疮也医好了。接着来到京城，几经周折，投在殷太监门下，自此发迹变泰。

魏忠贤死后，在阴司接受审判，是为“阴梦”。由于相士不合救活魏忠贤，魂魄也被拘来阴司受审，但又得到赦免，让他遍游阴司仙界，目睹善恶报应，纤毫不爽。都天大王杨涟要他回阳间后，把在阴司仙界的所见所闻，“细细详说与妄男子知道。”相士出梦后，便写出了这部《警世阴阳梦》。

相士在小说中贯穿始终，他是魏忠贤罪恶一生的历史见证人。作者通过他把阴阳两界连通，又通过他表达小说劝善惩恶的主题思想。

相术学对明清小说结构的影响最终是为了表达作者命定论的思想，看相、算命乃是现实生活中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家写进作品中，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所以读者看来，似乎作者是信手写来，其实是惨淡经营，我们读来不觉得有雕琢取巧的痕迹。它使得小说的结构更为完整、严谨而不松散。

三

最后谈谈相术学与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貌描写的关系。这方面的影响几乎涉及到明清所有的小说。

相术学对人的形态风貌的优劣评价，主要是依据它所认定的人的自然生理功能和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好恶准则。人的生理功能又主要本于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原理。相术学认为：人为阴阳二气所化生，“禀其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其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贤。”^⑥这也就是《红楼梦》

中贾雨村所说的：“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恶者之所秉也。”因此，自然规律就是人体的生成规律，人的完美的生理形态应与自然生成之道相符。董仲舒说：“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①人是“小宇宙”，天是“大宇宙”。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数和类的概念上与自然界进行类比。所以相术学认为，头和天都是圆形，以圆而俨正为好。脚如厚载万物的土地，以丰厚长正而又软者为贵，横短薄硬者为贱。腹腔如冶炼万物之炉，以圆形皮厚下垂者为佳，短小者为劣。等等。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相术学则把儒家伦理纲常融入命理，人的形态必须与社会伦理相统一。它把人的形貌分为尊卑、善恶两个对立的层次，所谓大人之相根深表重，小人之相惊疑不安，还有妇女之相“贞淫说”等，都散发着浓郁的封建道德观念。

在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貌的描摹常常就是遵循着上述相术学原理，不同的人物品貌有着严格的区别和各自固定的模式。帝王之相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龙行虎步，龙形凤姿等。公侯巨卿之相是日月两角耸起，伏犀贯顶，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如悬胆，方面大耳等。大将之相是河目海口、虎背熊腰，豹头环眼，燕颌虎须等，因为相术学认为：天庭贯顶，可“位至三公。”^②“五岳朝拱，官禄升迁。”鼻如“截筒悬胆，千仓万箱，耸直丰隆，一生财旺。”^③“口能容拳者，出入将相。”^④在佛教中转轮王及佛之化身所具“三十二相”和“八十二种好”中，包括垂手过膝相、耳厚广大修长相，明清小说中的帝王之相的描写是否受其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将领“豹头环眼，燕颌虎须”之相，则源于班超。万里封侯的典故，班超不愿老死笔砚间，曾去向一位相士请教，相士对他说：“你生成燕颌虎须，飞而食肉，当万里封侯。”小说中的张飞，林冲和常遇春都有此相，尽管历史上他们未必真是长得如此。据徐祯卿的《翦胜野闻》载：常遇春就“状类猕猴。”相术学又认为，“豹形之人性好杀，不过中寿而已。”^⑤张飞，林冲和常遇春三人的命运都是这样。以猛兽犴禽来比喻人的佳相，大概源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思维，原始人在狩猎生活中，发现人不及动物之处甚多，幻想自己得到某些动物的力量和灵巧，并模仿它们的动作，逐渐形成了图腾崇拜。如太日 打击氏人头蛇身，以凤为图腾，炎帝牛头人身，黄帝是有熊氏，帝喾以狮子为图腾，尧族以龙为图腾，还有以虎为图

腾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皆兽身人语。都是人、神和兽的杂糅体。这样我们对明清小说中描写的帝王将相之相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在形貌上酷似祖先图腾，便也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野性的、神秘的力量。奸诈之相则是“蜂目豺声”，《左传》中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史记》中秦始皇“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所以明清小说中的奸臣都是“蜂目豺声”之相，高僧、仙道和隐者之相是重颐碧眼，松形鹤貌。佛教是从西域传入的，“碧眼”是西域人的生理特征。松鹤则是长寿的象征。老寿星的形象是前额如壶，壶也同葫。《通考·郊祀考一》云：“周之始，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拾遗记》卷一《丹丘之国》中云：“（东海）之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壶形又如母体，所以壶是神秘的生殖力量的寓体，是母体崇拜、生殖崇拜、祖灵崇拜的象征物。”^⑥是生命力的体现。才子之相是“眉清目秀”，因为相术学认为，这是具有智慧的表现。总之，各类人都有一定的固定模式，都和相术身首面相、气色形神之说密切相关，都决定着个人的性格命运。

如何评估相术学对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貌描写的影响？我们知道，相术学注意到了宇宙自然规律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和制约，发现了两者之间有隐秘的内在关系，并试图根据自然法则来阐释个人的命运。这一学说涉及到了天文、地理、生理、医学等科学知识，因此，相术学中也含有某些科学成份，尤其是中医理论。如相术学认为：耳耸过眉者百岁不死，耳轮坚厚者长寿，耳轮薄者命贱，耳轮模糊者损寿，这些说法实为中医学“肾主脑”、“发为耳”、“耳坚者肾坚，耳薄者肾脆”理论的体现，并已在中医临床中得到了证实。^⑦再者，相术学的理论是相士们通过长期观察而累积起来的经验总结，所以也不排除有合理的成份。这样，明清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虽然受相术学的影响，但有时仍能取得生动传神的效果。如张飞“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表现了他刚猛暴烈的性格。又如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湾柳叶掉稍眉”，王府本在此有夹批云：“非如此眼，非如此眉，不得为熙凤，作者读过《麻衣相法》”。因为相术学认为凤目乃富贵之相，但“眼若三角，狠毒孤刑。”^⑧这样，一个美丽狠毒的少妇便跃然纸上。但

是，自然法则并非完全等同于人的生命形态，两者之间并没有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这就使得相术学中的伪科学成份远大于科学成份，人们不能完全把个人的外貌特征作为破译他命运的密码。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明清小说中描写到的人物外貌形态，凝固定型为象征个人命运的特定符号和标签，如上举张飞、林冲和常遇春，还有关羽、关胜和关铃等，外表形貌一模一样，但他们的个性其实是有差异的。这样必然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外貌描写程式化，它与小说中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可谓相得益彰。不但小说如此，中国的戏曲、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也一样。比如故宫博物院中陈列的历代帝王肖像，容貌就极为类同，周公和孔子的长像也难以区别。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描写公式化的成因探讨得很多，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症结所在，它的“罪魁祸首”应是相术学的影响。

相术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国人限于“象”的思维模式。《周易·系辞传》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又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是指天在自然界中显出各种气象，圣人根据它们来预测人事吉凶。同样人的各种形貌特征也是上天所赋予的“象”，我们也可依据它来判断一个人的一生遭际。《周易》中又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再化生万物，万物都起源于“太极”，因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物理合一，天人合一。这样，各种象之间的联系和组合是很重要的。比如《樗枰闲评》中张小山为魏忠贤看相，说他有“虎头燕额，飞而食肉；凤目剑眉，威权万里。熊背狼腰，异日定须悬玉带；龙行虎走，等闲平步上金阶。天庭高耸，中年富贵可期；地角方圆，晚岁荣华定取”的“大富大贵之相”。不足之处是“额蹙形枯眼露光，眉头常锁泪汪汪。六亲眷属皆无靠，父母双双定早亡。面容娇媚带桃花，路柳墙花处处佳。常得阴人来助力，风流到处不成家。气促声粗眼带凶，头长项短类猪龙……”，“象”之间的不协调，终于造成了魏忠贤早岁坎坷，晚年富贵，最后自缢的戏剧性的一生。

受相术学影响的明清小说，还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趣味。相术学虽然没有直接论述

到美，但它提出的人最佳形态的标准，其实就是人的美丑判断的标尺。这个审美标尺受人的生理功能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特定时代审美观念的形成。

它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情趣与西方大相径庭。在古代西方，人体美的鉴赏根据科学的“黄金分割率”，尤其是古希腊，男性美的标志是体型匀称、体格强壮、身手矫健。而明清小说中的男子美则体现在腰大十围、腹如孕妇、两耳垂肩、手常如绵、行动悠缓等。尤其是关于女性体态风姿的审美情趣，出现了灵与肉、情与理的分裂和冲突。所谓女“人形甚美必有甚恶；人形甚恶必有甚美。诚能知美中有恶，恶中有美，相术不减于姑布子卿矣。”^⑨把美等同恶，并与个人品德完全对立起来。与以柔和的曲线、动人的情韵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女性美迥然不同。贤妇多是体态圆满，手如干姜，上停长下停短。而歌儿舞女、妾妇淫女多是妖媚风流之相。这种审美情趣实是男权社会中，男子畸型心理的表现。还有“奇形即为圣人”的观念，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以丑为美的审“丑”心态。所以考察相术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方式，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挖掘出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邮编：200234）

①陆容：《菽园杂记》卷一。

②宋濂：《禄命辩》。

③朱国桢：《涌幢小品》。

④⑤⑥参见张明喜：《神秘的命运密码》。

⑤《御定子史精华·相》卷118。

⑥《神相全编》一《五法》。

⑦《春秋繁露》卷11。

⑧《神相全编》一《相骨》。

⑨同上《十二宫诀》。

⑩《神相全编》三《相口》。

⑪转引自翁乃健：《中国古代相术总批判》。

⑫参见《民间文学论坛》1987.3 刘尧汉《论中华葫芦文化》。

⑬《神相全编》六《神异赋》。